

中国苗学研究的历史脉络

张晓¹ 杨庭硕²¹

(1.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1;

2. 吉首大学,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苗学尽管是近年来才提出的学科概念,但围绕着苗族文化而展开的学理思辨却古已有之,至今亦然,且其影响还将沿袭至后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苗族,其文明的演进自然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从本体论展开的苗学研究,本身就是学科规范的基本要求。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外部势力和学理思潮的干扰,其间出现曲折迷惘本属意料之中的事情,因而从本体论、客体论的交互作用去回顾苗学研究的学理历史演变脉络,其间的沿革变迁从本体论时期、西方学理干扰时期、调整过渡期,到回顾创新期依次呈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苗学 学理脉络 苗族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5—0097—07

苗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其历史演化的发展过程,始终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直遵循“兼容互惠、协同共生”的目标,共同参与了共建共享的实际行动。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苗族人口有 9426007 人,在中国的各民族人口中排名第 6 位¹。中国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重庆、广西、湖北、四川、海南等省市区。

苗学是近年来才提出的学科范畴,是以苗族的传统文化演化历程、当代现实与未来的走向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无论就苗族文化,还是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专门学科都必然表现出本体论的特色。学科的第一次转折出现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西方学术界的客体论思潮开始对中国传统本体构成干扰与冲击。在其后的近一百年间,苗学研究的思潮为之一变,并因此而引发众多的困惑和迷惘。到了 1949 年,随着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新与旧、中与外学术思潮的博弈,苗学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充满曲折的过渡期。直到 1978 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并付诸实践,苗学研究正式进入了回归本体论的新时代。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苗学都是近年来才新起的新概念,其中隐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归纳与总结。立足于这样的现代话语,去回顾和反思苗学学理演化脉络,上述四个时期划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客观的归纳和评述。

一、苗学学理的传统本体论时期(1840 年以前)

大体而言,1840 年以前的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苗族地区的统治,基本没有受到境外势力的挑战和裹挟,致使认识苗族及其文化主要是中国学人按照儒家经典和王朝的典章制度去展开研究和探讨,其性质集中体现为从本体论的立场出发,以家国天

¹作者简介: 张晓,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原贵州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苗族文化;

杨庭硕,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民族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

下观为立足点,认识苗族与历代王朝的关系。该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对苗族的关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中央朝廷“教化”和“齐政”之需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招抚诱导将苗族民众感化为朝廷的“编户齐民”。尽管当时遵循的学科体系是中国传统的国学体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野,但其实际研究内容,却涉及到了现代意义上的众多学科。保留下来的文献,对当代的不同学科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资料价值,而研究的思路和学术思想与当时对国内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基本保持一致,相关研究成果,而今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学科必备历史资料库存。具体表现如下: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汉文文献对苗族及其文化均有所记载。早期典籍包括:《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晋)《华阳国志》《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新唐书》《旧唐书》《宋史》也有相关记载。此外,诸多的私家著述,如《酉阳杂俎》《朝野金载》《蛮书》等等,也有所涉猎。宋代以降,“苗”这一族称才正式进入汉文典籍记载,如(宋)朱熹的《记三苗》和朱辅的《溪蛮丛笑》。此外,涉及到苗族文化的宋代著作,还有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入蜀记》,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等。另唐宋两朝的文人所作的诗文,也有不少对苗族文化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但凡宋代以前陈述的汉文典籍,由于当时“苗”这一族称尚未定型,以至于以上所引典籍,有的将苗族称为“莫徭”、有的称为“盘瓠蛮”、有的称为“五溪蛮”等等,其指涉对象,往往将苗族与其他民族混称。因而对这批史料的考订、识读工作,至今仍然任重而道远。然而,对这些族称虽然争议不少,但对苗学研究的本体论实质却不构成原则性的挑战。

进入元代以后,正史才开始将苗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去加以记载。在《元史》《蒙兀儿史》《新元史》中,将苗族称为“苗蛮”或者“木徭”“木苗”“木佬”等等^[1]。这些名称出现的范围与当代苗族分布区域相吻合,而且所涉及到的苗族文化,当代的调查资料还可以提供复原的证据。

进入明朝以后,官方文书正式规范使用“苗”这个族称,但其他异名依然纷繁并存,如“东苗”“黑蛮”“平伐苗”“紫江苗”等等。与此同时,有苗族聚居的地方,其地方志都较为准确地记载了苗族的风俗习惯、语言、生计方式等相对具体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在《明史》《明实录》《明会要》中都有所反映,表明当时中央王朝高度重视“苗”这一民族的存在。对苗族文化的记载较为详实准确的地方志包括《大明一统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嘉靖)《思州府志》等等。此外,田汝成的《炎徼纪闻》、王士性的《广志绎》、郭子章的《黔记》、邝露的《赤雅》等私家著述对苗族及其文化都有记载。

总的说来,1840年以前对苗族相关的研究,大多是将苗族作为一个朝廷需要加以“教化”和“齐政”的对象去展开相应的分析和探讨,得出的结论其说不一。有的学者主张需要严厉镇压,有的学者主张对苗族需要用仁德去感化,有的认为各地方官需要关注苗族居民,但又要将苗族按照朝廷法规去加以约束和节制,同时又必须加以关爱、理解和照顾。学者们提出的方略虽然有别,但始终是以本体的视角和观点,将苗族作为天下生民和海内赤子去加以教化和齐政。反映以上诸类观点的著述,就清代而言,主要有《清实录》、(康熙)《湖广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皇清职贡图》、(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乾隆)《黔南识略》、严如煜《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和张树的《续黔书》、李宗昉的《黔记》、方显的《平苗纪略》等等。此外,清代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也有关于苗族文化的记载。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上各种历史文献典籍中,对苗族族名的使用依然表现为多种异名并存,在认识和利用这些典籍时,也需要做较多的考订、甄别和识读工作。

二、西方学理干扰时期(1840年—1949年)

1840年后,中国的国门被英国等西方列强打开,西方国家的学者、传教士及商人等因此得以触及到中国的苗族,并按照近代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规制,将非欧洲的其他一切民族,都视为该体系中民族学研究的对象。西方研究者的学术思想中,本身就掺杂进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观念在其中,以至于他们不仅是研究中国的苗族,对其他民族的研究都打上了他者立场的烙印,进而将民族及其文化视为个人权力及其对所谓平等博爱的追求,放大了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去展开内外有别的探讨。在这样的学理背景下,苗族文化学理的研究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他者”的烙印,并对中国的传统苗学研究构成冲击、干预和妥协,使

中国的苗学学理为之一变。

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先后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苗学研究学理规范的实践。中国学人中，不乏有识之士对西方学理的冲击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但在西方列强压境的大背景下，倡导全盘西化，一切向西方看齐的学人也为数不少，“主体论”和“客体论”的较量，由此贯穿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后，国际上先后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体制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对峙等。在这样的国际大变动的背后，国外学人则秉持了文化“客体论”的立场和观点，着手对中国苗族展开了相应的探讨。与国外的苗学学者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学人的研究集中表现为中国学理与西方学理、传统学理与现代学理的错杂并存。在研究取向上集中表现为传统国学与西方学科体系的相互渗透和博弈，而相互渗透的程度往往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合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树表现为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对民族谱系的编制，明确认定苗族文化属于藏汉族类下属的一个文化支脉，苗族族系与百越族系、氐羌族系并列为中国西南民族文化构成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还衍生到了中印半岛的北部。此项成果是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消化西方学术思想基础上完成的，在其后的苗学研究中得到了认可和沿用，澄清和规范了前代学人的相关表述和结论。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导读部分，王建民与麻三山如是评价：“它是我国民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

此外，在这一时期内出身于苗族的中国学者开始跻身于苗学研究的行业，其中最卓越的首推杨汉先，他在华西协成大学求学期间，就开始编写《苗族述略》等有关苗族的论著。杨汉先的研究内容，包括对苗族远古历史的追忆，苗族现状的介绍等，始终贯穿着追求苗族文明现代化的激情。同为苗族出身的还有梁聚五和石启贵。梁聚五除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外，还撰写了《苗夷社会发展史》等著作，利用学术来表达包括苗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争取政治、文化和地位平等的渴求；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强烈呼吁苗族的政治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伍新福称其书集“民族学、民俗学、苗族历史和语言文化的多方面知识的科学著作”^[3]。杨汉先、梁聚五和石启贵三位，从苗族分布的西部、中部和东部不同地区表达了同样的心声，作为苗族最早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开创了苗族学者的“自我呈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一时期国内的苗学研究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阶段。早期的研究都是围绕稳定国内政局而展开，特别是对苗族起义作出了应对性的探讨，《圣武记》《岭表纪蛮》《黔语》《苗疆闻见录》《平黔记略》《咸同贵州军事史》等涉及苗族的内容较多，也较为集中。从学问探讨方面看，魏源所做的分析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大致沿袭了国学的传统，对外部殖民势力侵扰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奈。

针对一些国外学人以侵华为目的的研究倾向，中国学人也开始立足中华民族的传统学理展开回击，双方围绕苗族及其文化研究展开的博弈也逐渐趋于白热化。其中的代表性研究者，如章太炎、蔡元培等民族革命活动家，他们研究成果集中表现为致力于证明苗族及其文化的延续性，苗族民众与中国各民族血缘脉络上存在的关联性。蔡元培在引进西方民族学学理的同时，还直接组织、开展过对现代意义上的苗学研究。在蔡元培的主持和推动下，凌纯声、芮逸夫对苗族展开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编写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并培养了以石启贵为代表的民族学学人。此外，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吴泽霖和陈国均《贵州苗夷社会调查》、刘锡蕃的《岭表纪蛮》和《苗荒小记》、杨汉先《黔西苗族调查报告》等很多的研究工作也包括了苗学研究的内容。

这一时期的晚期，抗日战争将苗族的分布区置于交战的前沿地区，中国的知名学者持续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致力于苗族研究的杰出学者，除了凌纯声、芮逸夫和杨汉先之外，还包括吴泽霖、陈国均、江应樑等。此外，任可澄、杨恩元等在编修(民国)《贵州通志》的过程中，还组织过对包括苗族在内的贵州少数民族调查，其成果编进了该书的《土名志》。出身苗族的石启贵、梁聚五也在这一时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民族观。张琨在苗语方面的研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苗语内部的方言探讨奠定了现代意义的苗族语言学研究基础。吴泽霖、陈国均率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西南边区考察团”在苗区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铺垫了之后展开民族识别的基础性工作。他们的工作和凌纯声的探讨足以相互补充、相互提升。江应樑的《西南边疆

民族论丛》则是针对边疆治理的需要探讨了苗族的远古历史，强调了苗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性。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苗学的研究，由于受到战争的干扰，很多研究成果大多推迟到抗战结束后才得以出版。《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甚至到了1983年才由张永国、史继忠、石海波、韩雪峰编辑，并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铅印为内部参考资料。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与西方学理思想交错博弈的特殊时期，总体表现为，苗学研究一方面沿袭着中国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无法彻底地排除客体论的干扰，甚至出现两者相互替代的情况。值得补充之处在于，这一时期的苗学研究中，中国的传统学理文脉的根基并未动摇，研究者对西方学者的回应虽说难以精准到位，但各式各样的回击却从未间断过。

三、调整过渡期(1949年—1978年)

1945年，“二战”结束，世界格局进入“冷战”时期。这一时期的国际社会格局是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垒为标志，但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更具特殊意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困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苗学研究也成了研究领域之一。不过，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事项的变迁，通常都属于短时段的社会历史事项，变迁的速度相对较快，但学术思想的调整和回归正轨，则肯定会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列强的干扰虽然结束，但对中国的封锁和渗透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以至于学理方面的调整也绝非一帆风顺，各种各样的西方学术思潮，包括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理冲突还会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影响到中国苗学研究学理调整的正本清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梁聚五先生印出了他先后写的《苗彝民族发展史》和《苗族人民在反清斗争中跃进》两部书稿，马少侨先生出版了《清代苗民起义》等等。1956年至1964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科学调查中，由费孝通、吴泽霖、夏康农、黄现璠、岑家梧等等分头负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资料搜集和积累。在这样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研究者们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如，长达7万字的《炉山黑苗的生活》、10万字的《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等，均是作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吴泽霖在黔东南进行试点调查的成果。在政府积极推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苗学学者以及作品，如王辅世的《苗语简志》，费孝通的《兄弟民族在贵州》《劳动的苗家》，罗荣宗的《贵阳高坡苗族》，麻树兰的《湘西苗族民间文学概要》等等。

这个时段最突出的成果是苗语的研究。在此前张琨苗语研究的基础上，王辅世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副队长，和队长马学良一起主持苗瑶语的全面调查，根据调查材料设计了4种苗文方案，并进行试验推行。王辅世还组织编写了《苗语方言概况》书稿，其著作《苗语简志》“提出了将苗语划分为湘西、黔东、川黔滇三大方言和川黔滇方言下分七个次方言的方案”。^[4]王辅世于1957年发表的《贵州威宁苗语量词》一文，详尽地分析了当地苗语量词的多种形态变化，并指出威宁苗语的量词具有类似印欧语中冠词的作用，这一创见，在国际语言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辅世与他人合作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部分)》等等。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苗族文字创立出来。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等据此创设了苗语专业本科班、专修班和培训班，培养了大批苗语研究人才。马学良、邝昌厚、张永祥、陈其光、李永燧、陈克炯、潘元恩、罗安源、曹翠云、易先培、应琳、何日征、爱卿、乐赛月、王春德、王德光、李壁生、石如今、张济民、莫启明、杨文瑞、夏勇良等都投入了苗族语言的研究，语言文字的研究夯实了苗学研究的基础。中国解放初期对语言的重视，苗学取得如此成就，与俄罗斯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的苗族研究的工作有关，中国科学院语言学顾问谢尔久琴科在1955年建议和推动召开中国科学院汉语会议及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并于1956年6月在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做了《论少数民族学校中的民族语言教学》的报告等。这批前苏联学者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对苗族及苗族文化的界定和苗族文字的编制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对于清算和扬弃欧洲中心主义思潮发挥过不小的作用，对于正确评估苗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也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相关误判，直到今天还左右着部分研究者的科研工作。

这一时段苗学研究比较突出的另一成就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苗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统一文字，大量的知识靠口耳相

传习得，因此民间文学承载了很多历史文化信息，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也是一种社会调查。以贵州为例，省文联组织队伍搜集整理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70多卷，其中苗族的占了一半以上。对此，唐春芳、燕宝、潘光华、伍略等等解放初期的苗族知识分子做了很大贡献。稍有不足的是，如何通过口传资料和当代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再加上考古资料和汉文典籍资料结合的方法，去复原苗族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实践理性而言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得苗族文化的本体论研究，以及苗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关系的历史研究，不得不徘徊在传统的水平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间的关键在于，此前西方民族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潮还有其影响力，以至于中华民族的本体论没有在学理层面上达到自尊自信的高度，苗学的学理创新也因此而受到拖累。

四、回归创新期(1978年—1999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和付诸实践，苗学研究的学理正本清源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苗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一时期，苗学的成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丰硕得多，学理也重新回归中华民族的本体论。具体研究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内容：

其一，将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并公开出版。例如苗文又重新被研究和运用，马学良、王辅世、今旦、张永祥、王春德、鲜松奎、田逢春、吴平、李炳泽等发表了大量的成果。其中，今旦还提出搞双语教学并编写了教材。此前编辑的苗族民间文学也首次整理出版，《苗族古歌》(唐春芳等搜集整理，贵州民间文学组整理，田兵编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该书曾获国家一等奖)也在其中。田兵指出“它的历史价值，还可能远远超过文学价值”。^[5]《苗族史诗》(马学良、今旦搜集整理，翻译为英文在国外发表)、《苗族古歌》(燕宝选编，苗汉文对照)、《苗族民间故事选》，原来搜集整理的70多卷《民间文学资料》内容公开出版。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调查的资料到这时才得到系统地整理出版。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新规划，在原来民族调查、民族识别的基础上系统汇编成《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五种丛书。《苗语简志》《苗族简史》《苗族简志》和各苗族自治县的“地方志”也先后出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从1983年就开展“贵州民族调查”并汇集成册，每年一集，至今没有中断，这些民族调查中苗族占2/3的比重。有苗族分布的周边各省，也做了相应的工作，公开出版了一批涉及到苗族及其文化的论著。与此同时，各苗族自治县、县也建立了相应的苗学研究机构，并出版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其二，深入展开不同的专题研究和讨论。如，关于苗族族源问题，苗、汉族等各民族学人均持有各种观点，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后，于1985年10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苗族简史》一书。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苗族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再如关于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的争论，李廷贵、果酒素提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6]韦启光对此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其间的分歧和差异均表现为术语使用的规范问题，并不足以反映真正的实质问题，但是这样的争议对于深化认识确实值得肯定，没有这样的争议，苗族文化历史的真相，就无法得到世人的关注和认识。伍新福认为“尽管看法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看到和肯定了‘鼓社’与‘议榔’制在苗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无疑将有助于揭示苗族社会状况和发展规律”^[7]。

其三，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完善了对苗族文化的整体认知。民间宗教信仰方面，有杨通儒的《解放前的苗族民间宗教》，岑秀文的《榕江八开苗族地区的原始宗教》等；古歌中的哲学认知方面，有李廷贵的《苗族先民关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何彪、吴晓平的《苗族古歌〈枫木歌〉的人类起源观初探》、雷安平的《古代苗族哲学思想再探讨》、张晓的《苗族古歌所体现的价值意向探讨》等；苗族医药方面有龙文玉的《苗医苗药概论》等；苗族艺术文化方面，吴荣臻的《试谈湘西苗族的艺术特色》；民间文学方面，有马学良的《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潘定智的《试论黔东南苗族爱情叙事长诗》、李廷贵和酒素的《苗族古代文学》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对苗族服饰的研究关注度较高，有付木兰和陈宁康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蜡染》，特别是岐从文《贵州苗族服饰的源流及其形式美》一文认为“苗族服装渗透着美学原则，展现出自身独特性”²，以及民族文化宫展览馆的大型彩色画册《中国苗族服饰》等。另1982年6月在贵阳还举办了“贵州苗族服饰展览”，1984年4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中国苗族服饰展览”。这些展览的成功，又反过来引起学人的重视。

这个时段的苗学队伍除了少数人是解放前接受教育外，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如龙正学、今旦、许士仁、唐春芳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都焕发青春，成了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本体论的回归正轨，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得以体现。例如，贵州的李廷贵、翁家烈、龙伯亚、杨庭硕、今旦、唐春芳、燕宝、王治新等等；湖南的伍新福、龙海清、吴荣臻、雷安平等等；云南的杨光汉；广西的朱慧珍；四川的龙正学等等。从学科来说，这个时候对苗族史研究的历史学队伍最强。贵州的翁家烈、杨庭硕等是云南大学历史专业或者民族史专业毕业，伍新福是湖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等等。这些老一辈的研究者专业功底扎实，在《苗族简史》的基础上出版了《苗族史》（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历史探考》（伍新福）等。

从苗学角度来说，影响力较大的人物是李廷贵，他是最早被邀请到国外讲学的学者之一。他对苗学最大的贡献是成立了贵州省苗学会，正式提出“苗学”二字。还有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唐春芳，他对带有贬义色彩的民族文化事项汉语翻译毫不留情地开展批评，并引发了苗族学者内部的大讨论。例如，从苗语表意的本体论出发，用“游方”代替“摇马郎”，就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在年轻一些的学者中，杨忠对苗学的研究贡献较大，他于20世纪80年代就创办并主编了《苗侗文坛》，直到现在依然刊出大量有影响力的文章。

总之，这个时期国内的苗学研究热情很高，其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有重大影响的论著也超乎于前代。值得肯定的是该时期的学者们在学理脉络上回归了主体论的研究，从苗族文化的实情出发深入了不同题材的研究，苗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依存共荣关系得到了较好的阐释。在苗学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对西方学理思想中的唯物观和辩证观以及相关理论的引用、消化和吸收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西方学者对苗族文化的扭曲和贬低，也得到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匡正。

1993年之后，中国苗学研究更是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苗学研究进入了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立的新阶段。在以历史研究为主要课题的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苗学的领军人物大部分是出生于苗族的历史专业学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伍新福研究员，继原来出版《苗族史》之后，又出版了《中国苗族通史》（上、下册）（1999）等八部历史书籍。吉首大学终身教授杨庭硕从事研究30多年，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科研成果报告20余篇，主编过《百苗图研究丛书》《历史民族志研究丛书》《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国外人类学翻译丛书》多部，苗族是其主要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代表作为《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该书对苗族族称的历史源流作了系统梳理，对苗族众多的异称由来、能指作了较为准确的考订。

贵州民族研究院翁家烈研究员在贵州民族研究界声望极高；贵州民族大学李锦平教授在黔东南苗语方面成果丰硕；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石朝江研究员成果丰硕，出版了《中国苗学》《世界苗族迁徙史》等多部专著；张晓出版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被同行评价为对妇女口述史、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做了重大的贡献等等。^[8]民间文学方面，新的成果继续推出，例如，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等主编《苗族古歌》和王安江演唱版的《苗族古歌》；燕宝主编的《贵州神话传说》《贵州民间故事》（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的《西部苗族古歌》；以及各地区或者各县推出的各种苗族古歌版本。如潘定智所言：“苗族古歌还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9]这也是各种苗族古歌版本得以丰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麻勇斌的《苗族巫辞》、杨昌国的《苗族舞蹈与巫文化》、杨正文的《苗族服饰文化》、罗有亮的《苗语语法》等等著作反响较大。

其后，苗学研究有一批批新人出现。这些新人多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受到了专业训练的博士研究生，中国的苗学研究上了新的台阶，苗学成果多不胜数，研究质量不断提高，理论对话也逐步展开。其中，最关键的突破在于，中国传统的本体论学理渊源得到了回归和发扬光大，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历史、文化、自尊、自信，及其相关的创造和发明，始终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苗族历史文化与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关联性，都在研究当中得以确认。对此，笔者充满了信心和殷切的期盼，苗族研究的学理不仅属于当代，同样属于未来。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对苗学的研究也自然成了中国化、本土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 [1]杨庭硕. 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51.
- [2]凌纯声, 芮逸夫.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Z].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
- [3]伍新福. 苗族历史探考[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2:392.
- [4]王辅世, 赵习, 编著. 苗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5:3.
- [5]田兵, 编选. 苗族古歌[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79, 前言:3.
- [6]廷贵, 酒素. 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J]. 贵州民族研究, 1981(4):42-47.
- [7]伍新福. 苗族史研究述评[J]. 民族研究动态, 1984(4):5-14.
- [8]刘伯红, 主编.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6-2000[Z].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4:434.
- [9]潘定智. 苗族古歌三议[J]. 思想战线, 1987(6):52-57.

注释:

- 1 参见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 2 岐从文在《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2月发表的《贵州苗族服饰的源流及其形式美》对此作了介绍。